

The Question of
Women and Minimization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

(美) 汤尼·白露 著 沈齐齐 译 李小江 审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 / (美)白露
(Barlow, T.) 著; 沈齐齐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ISBN 978-7-208-10482-2

I. ①中… II. ①白…②沈… III. ①妇女问题—研
究—中国 IV. ①D6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0583 号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by Tani Barlow

© 2004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张玉贞
封面装帧 赵瑾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

[美] 汤尼·白露 著

沈齐齐 译

李小江 审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2.25 插页 2 字数 433 千字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482-2/G·1486

定价 48.00 元

献 词

历经数年,本书终于作为一项研究项目的成果在此呈现给读者。伊爱莲(Irene Eber)、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韩格理(Gary Hamilton)、玛丽琳·杨(Marilyn Young)、顾彬(Wolfgang Kubin)和普莱斯(Don Price)都曾阅读过本研究中某些或所有最初那些篇章。20世纪90年代,我在两个常年坚持活动的湾区读书团体中找到了对话者。在茵德帕尔·格雷瓦尔(Inderpal Grewal)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读书团体中,我提出了自己特有的历史词语误用主题、符号的边缘化以及殖民现代性的问题。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在各种场合都对这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运行和谐的骆明达(Donald M. Lowe)“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读书团体中,那些对德里达(Derrida)不间断的批评性研读,使我开始忍住不去管顾我在读研究生时曾专注一时的一些历史和编史问题。也是在那些年里,王人力(Renli Wang)和我一起研读过陈宏谋。安吉拉·齐托(Angela Zito)、王瑾(Jing Wang)、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海维亚(Jim Hevia)、顾彬、李陀、弗朗辛·温道斯·特万(Francine Winddance Twine)、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多尔西·格林(Dorsey Green)都曾鼓励我完成本书。我感激他们不求回报的鼓励。

本书的草稿完成后,坂元弘子(Hiroko Sakamoto)、孟悦、杰奎琳·

伯曼(Jacqueline Berman)、戴锦华、刘大卫(David Palumbo-Liu)、乌塔·波伊格(Uta Poiger)、李小江、德博拉·波特(Deborah Porter)、梅仪慈都帮助我认真审查了各个章节,他们的真知灼见补充和丰富了我的观点并校正了所出现的错误。我感谢华盛顿大学的彭文斌、韩伯仁(Brian Hammer)、斯科特·爱德华·哈里森(Scott Edward Harrison)、保罗·沃克(Paul Walker)、易素梅、张梦亮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予我的支持,以及在本书修订过程中韩伯仁、里基·汤普森(Riki Thompson)、塔米科·尼默拉(Tamiko Nimura)完美的书稿编辑能力。刘伯红、丁淑芳(Dora Dien)、舒海澜(Helen May Schneider)、涂绍钧、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刘健芝、刘惠英、严海蓉和王政保证了我所需资料的来源,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鲍家麟(Chia-lin Tao)、坂元弘子、陈力卫答复了我的各种实际问题。1999年,鲍夏兰(Claudia Pozzana)和亚历山地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为此还组织过一个“亚洲批评研究项目”的研讨会,它证明那是一次就集体研读的乐趣来说很值得回忆的会议。华盛顿大学“现代女性研究小组”中的普里蒂·拉马默蒂(Priti Ramamurthy)、乌塔·波伊格、林恩·托马斯(Lynn Thomas)、董玥(Madeleine Dong)和艾丽斯·威姆鲍姆(Alys Wembaum)提供了交流联谊的机会,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琼·奥尔曼(Jean Allman)、苏珊·波特·班森(Susan Porter Benson)、迪娜·科普尔曼(Dina Copelman)、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ger)也做了同样的事。我还感谢华盛顿大学社科副主任苏珊·杰福兹(Susan Jeffords)的帮助以及系主任朱迪思·霍华德(Judith Howard)为我安排的专门研究学期,使我得以完成书稿。作为多年的学者和朋友,我与埴由起子(Yuki-ko Hanawa)和王瑾在思想和学术交往中结下了友谊。

雷诺·史密斯(Reynolds Smith)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编辑。他颇得好评的耐心和友善使他过去搜罗出版的书籍堪称一流。正是由于杜克大学出版社对出版物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敏锐而持久的学术鉴赏力,才使得本书更为引人注目。我感谢罗丽莎(Lisa Rofel)能够允许我在此

对她致以谢意,也感谢国际友人们的帮助,尽管有时是无意间提供的。丁玲提示我注意历史文献的准确性;戴锦华在我起草第七章时向我提供了原稿和一些新出版的书;张京媛向我证实了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何把主要的女性主义作品从法文译成了中文。琼·斯科特(Joan Scott)以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善良使我从一开始就理清了思路并使之贯穿于整个项目之中。展现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著作并对其进行研究也是令人愉快的经验。2000—2001年间在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性别研究所和一桥大学时,我就本书中几个部分为同事们作了介绍。感谢东京学者的回应,尤其是坂元弘子、秋山洋子(Akiyama Yoko)、宫尾正树(Masaki Miyao)和一藤るり(Ruri Ito)所给予的热情反馈。出版过程中,贾斯汀·费尔伯(Justin Faerber)在认真细致地阅读书稿之后还对其作了改进。

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无论我取得了什么成绩,在此也一如既往,我都最由衷地感谢我亲爱的伴侣骆明达,感谢他对我坚定不移的信任和对本书自始至终慷慨睿智的帮助和奉献。

2003年11月

目 录

contents

献 词 I

导 论 1

第一章 历史与词语误用 20

一 过去的未来 21

二 传统中国的“妇女” 25

三 社会史的界限 29

四 历史性的词语误用 37

附录:编史与词语误用 44

第二章 论“妇女” 63

一 历史上的主体妇女 65

二 制造女人(“女性”) 76

三 再造“妇女” 82

四 妇联和作为国家范畴的“妇女” 87

第三章 进步论:中国女性主义的基础 98

一 公民身份和国际主义 101

二 梅生和中国妇女问题 107

三 高铨和 20 世纪 20 年代进步论女性主义的主体“妇女” 112

四 殖民现代性 121

五 性别主体理论中的(女性)无缺陷问题 125

六 进化、异性恋诗学、“人格”:岛村民藏、易家钺和陈德徵 139

七 结论 161

第四章 殖民现代性: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性” 177

- 一 新女性 180
- 二 马克思女性主义主体 204

第五章 毛泽东民族主义:丁玲思想中的“妇女” 255

- 一 毛泽东民族主义的主体“妇女” 260
- 二 毛泽东主义、妇女和政治表述,1942 281
- 三 《“三八节”有感》和文学上的“妇女”问题 286
- 四 写作、情感和“妇女” 299
- 五 “过去的未来”中的“妇女” 305
- 六 丁玲——后—毛泽东时期共产党妇女运动的偶像 314

第六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李小江的市场女性主义 337

- 一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的群众基础 339
- 二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科学与妇女研究 349
- 三 李小江的市场女性主义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解放理论 353
- 四 李小江与性 381

第七章 全球化:戴锦华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后结构女性主义 395

- 一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即有关异性恋的性 401
- 二 文化研究 426
- 三 口头书写与文化地图 446

结 论 462

参考书目 473

导 论

历史不是自然延续而是历代日积月累起来的。过去的记录保存了下来,供后续的世代去研读或不研读、焚烧或抹煞、无视其存在或对其细细梳理以便认真地从中寻找带向未来的迹象。记忆被抹掉了,创伤戳进了无意识的深处,在那里每一个承续的后代都定位在新的位置上,对照多半已被忘却了的历史背景,重新思考其关注的问题。进步的历史就这样被回溯性地书写了下来。本书把注意力集中在众多持续进行的历史事件的不连贯性上,它是上个世纪中国女性主义启蒙思潮断断续续积累的一部历史,也是对从事打造现代性政治秩序的每一个理论工作环节的新的思考。

多年来,我从词语误用(catachreses)中找到了一种解读历史证据的方法。按照惯例,词语误用是指对专有名词的特殊误用,在其中,词语的所指对象,从理论或哲学上讲,是不恰当的。对历史性的词语误用(historical catachreses)的利用于我是一条捷径,使其在分析上的不充分变成一个积极的价值。在其被当作历史性的词语误用重新考虑时,普遍存在的描述性专有名词就成了清晰易读的社会经验的知识库。例如“女性”和“妇女”,在中国女性主义妇女史中就是这样的关键术语。然而,我不是从文本或文本之间的关联来解读这些词语,而是从历史角度解读它们。我在强调其不同内涵的同时也把重点置于其中心地位和

它的不稳定性上,即历史学家所说的偶然性(contingency)上。我也论证这些词语在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它巩固了我的论点:历史性的词语误用所产生的力量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源自相应的调解作用或思维体验。

正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关键词的解释,历史性的词语误用强调人们的日常规范或常态化经验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与福柯(Foucault)的谱系学一样,词语误用的历史也集中在命名上;这种解读的方式其结果是唯名论。但是,按照福柯的方法所示,观念史和词语误用史之间是有差别的。观念史可以思考“身体的历史”,并用已知的时代或语言画出一条解释身体历史的发展路线。词语误用“身体”的历史起点,有可能是肉体的存在理论以及对当代理论所假定的物质条件的调查研究。换言之,历史性的词语误用是一个意识形态实体。它使可能性保持开放状态,即“身体”可能在一个时期对思想和经验是重要的,而在其他时期却不是。

历史性的词语误用就像是一种修辞手法。对那些授予其意义的人们来说,其价值符号还依然保留着;它保存着其他时间和地点特点的运作方式和常态化策略的痕迹。因此,界定充满满意的词语并把它们称作词语误用,就像我特别对待词语“女性”和“妇女”那样,意味着我被吸引到了一个在经验及其观念作用之间没有差别的领域。历史性的词语误用,是被高度概念化了的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用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的概念来说,它们是概念一比喻,以传播的影响力解释日常生活,并因此而证明、界定和稳定我们的活动。这种为历史性的词语误用定位的解读方法强调思想活动。它在某个特定方面是思想的,那是因为,进行思考的环境始终被包含在思想内容里面。^[1] 鉴于让我感兴趣的思想家都是现代的,本书隐含的希望是,它将最终有助于说明,对人类社会存在的现代解释如何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变得规范,以及老一套的规范为什么那么经常地(至少是在理论中)是以女性为中心的?

在努力强调中国女性主义妇女史中历史性的词语误用的重要性时,我突出了历史书写中的过去未来时。过去未来时是一种词语结构,用来强调被包含在现在时刻(或过去中的现在时刻)那个隐蔽的或预期的未来。过去未来时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中极为有用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表现了过去异质的性。承认现在始终是异质性的,会使我们对理论家及学者向读者提出的愿景变得敏感起来。也就是说,那些作者心中怀有未来,他们可能渴望公平、权力或权利;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未来的存在——在那里,合法的要求者会成功地实现其主张。但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有关女性主义史学的“过去的未来”(Future Anterior),是想特别指出:对“妇女将会是什么”的强调,实际上动摇了文献证据中对妇女的所指。它置换了我们看妇女的方式,从看其现状转换到看其潜力。在一个特定的过去中重新开辟未来,会导致史学家动摇其做出——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设想,流入到无穷无尽的变迁中。用本雅明的话说,时间的停滞使得从过去爆破出来的东西成为可能性。检讨历史性的词语误用,使我们回归到这些丢失的可能性或欲望,而过去未来时却召唤来了过去那些人们所面对的别样世界。

对“妇女曾经可能是什么”的时间性的关注,突出表现在女性主义作家的著作中,因此,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考察是极为有益的。第一,它像我们一样重复并巩固了这样的事实,即过去的理论家们激发了各种期望,并不是被动地描述“背景”的真实性即所谓事情的原貌。第二,由于过去未来时的重点集中在思想活动和思想中未来的作用上,它唤起了人们对典型的意识形态式的或最老套的女性主义思想风格的创造力的注意。第三,它为妇女历史写作赋予了女性主义的品质,即琼·斯科特描述的那种法国女性主义未完成的混乱状态。^[2]第四,强调分析历史事件中对未来的憧憬,加深了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划时代但又常常是未完成和不连贯的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种强调的转移,承认了妇女范畴在历史上是不稳定的这一老生常谈,使我们能够更细致地去关注理论家如何干预、形成和确定那些表现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资源。

这不是赢家们的历史。不仅是这些在此被高度评价的思想家们成了“历史的输家”，其他的人也几乎被遮蔽和被遗忘了。乃至他们成了名人，就像丁玲，却也只是断续地被人想起，因为她们对妇女美好未来的期望尚未实现。

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关于当代民族及其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它始终是“民族主义的”，或者说女性主义永远是男女知识分子在其日常研究工作和写作中关注的中心。确切地说，在编撰这部断续积累起来的中国女性主义著作的过程中，不断影响和打动我的，是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回归到重大事件上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从20世纪20年代“妇女问题”在普遍的思想进程中真正占据了首要地位时起，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共产党革命的发展话语中对爱国的妇女形象的重新塑造，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女性主义的广泛宣传 and 艰苦的重建，以及后毛泽东时期思想领域中的性别公平运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批评潮流持续不断地繁衍蔓延到整个精神生活。无论其问题是纯正民族文化还是对自然文化观的响应，无论关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动员还是种族改良、国际竞争、全球公平或对“性别消费主义”的批评，女性主义意识和关注的问题一直都是民族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

中国女性主义民族传统的浮现基于相当复杂的前提，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女性主义的，它们包含了完全不同的成分：早期性学理论的超现实主义民族志、优生学家对权力意志和现代分类体系以及对异性恋正常性的生物科学的强调、毛泽东主义的道德规范等等。这一折中主义基调还意味着，尽管中国女性主义通常是民族主义的，它也始终还是别的东西。正像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世界其他地方国族女性主义(national feminism)的创始者那样，中国理论家们投身于国际性的社会进化论和革命思想中，他们同时以民族主义者和憎恶民族主义这两种身份投入其中。如同本研究表明的那样，一旦资产阶级殖民现代性的偶然性基础(contingent foundation)构成就绪，中国后继的理论家们

就会在其他世界理论场所重新争论妇女解放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球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后结构主义,各自都在民族国家向国际性的国家体制和全球资本的变换关系中兴旺发达起来。随之而来特别重要的两点是:一种不连贯但却持续长久的记录,证明了欧洲、北美和日本以外的思想家们是如何运用了普遍的启蒙“理性”权力。另外,一旦女性主义对革命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得到肯定,西方对女性主义的专有权就会让人感到较少强制性了。

社会理论是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档案。本书的有些章节明确地探究理论写作,如社会进化论,或早期父权制及精神分析理论。另一些则依次涉及美学理论、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或群众运动的道德规范。不过,每一项分析都给予社会理论以特权,恰恰是因为(而不是尽管)其抽象或断定普遍范畴的能力。在一个源自档案的历史中(该档案并非仅仅从本质上说具有普遍的理论性,而是其本身就是一个普遍性理论),在激烈的争论中思维范畴被清晰地呈现出来,是因为其中利害牵涉重大;理论宣称它不亚于真实。启蒙理论和社会科学被用来和社会存在的真理相提并论。真实是对启蒙理论中充分性的记载,这一假定本身迫使史学家们(那些不论好坏的社会科学家们)接受普遍的主张,即便它们不过是来自“中国”。所以,我的主张并不是关于知识的定位,而只是一个简单的提议,即倡导真实的启蒙理性无论在哪里出现,也不管它们源自何方,都应当被看作是普世性的。中国女性主义不容争辩是中国的,而且,它就是女性主义,就像日本社会科学是日本的和社会科学的一样。[3]

这些就是根据理论提供的证据而构成的某些历史特点。在此尚有最后一点需要明确指出。在分析写作中,有必要尽其所能去弄清那些在你的研究和其他理论家的研究中都可能是处于争论中的设想。有时候,在我的研究课题和我自己的思想立场的两重关系之间,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即存在着一些将我们潜在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的公共区域,致使一种史学家与其主题之间的素朴关系呈现出来。这不是一个纯粹解释

的问题。我所依赖的证据并不特别浑浊也并不主要就是一种叙事或一个故事。关于恋爱和择偶自由的优生学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也在今天,由高铨、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潘绥铭和南希·弗莱迪(Nancy Friday)提出。重新解读已有一世纪之久的社会理论,对人们是某种程度的提醒。它提醒人们,今天鼓舞着女性主义的那些设想,是以早期的大众优生学为前提的。大众优生学一直都是那些设想的构成部分,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这些设想高度巩固了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大众文化女性主义。〔4〕

本书共有七章。第一章“历史与词语误用”,谈到中国妇女新社会史的全盛时期存在着一些重要疏漏。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史学家如何能够避免使妇女既不成成为社会史自身程序规范的结果(例如:妇女总是相同的解剖学、社会科学的主体),也不成为男性论证中的症候并因此在男性偏见的阵地上被消除?这是一个历史方法问题。因此,该章全部用来讨论史学体系是如何既促进同时又限制我们“作为女人”直接谈论中国妇女。它的做法是,将性别史的主体自身包含在思想史中,汉语里妇女的新词语随之进入到过去的历史资料中,成为研究的切入点。也就是说,该章节并不专门关注“主体”理论。其目的是,在那些书写的证据和档案记载的历史中,建立起历史性的词语误用的价值,并认真对待证据本身所传达的那些存在论的主张。我对20世纪20年代优生女性主义中妇女作用的描述,就是详尽讲述它是如何运作的一个例子。

第二章“论‘妇女’”,我用重墨广泛介绍了词语误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这个问题在第三章“进步论:中国女性主义的基础”以及第四、五章中也都有详细的展开。“论‘妇女’”一章按时间先后顺序,确定了中国政治中妇女词语误用的史实性。这一做法的重点,是为了确定中国20世纪社会思想生活的反复碎裂(殖民现代化、社会革命、被林春称为“革命现代化”或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性别主体的主导形式下,它处于不可逆转的骚动和日积月累的变化状态中。〔5〕关于人类存在的自然环境的新分析范畴和新科学观念,对中国新生学术精英阶层的日常经验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殖民建筑、大众传媒技术、社会组织模式和政治表达方式。然而,由于殖民现代化影响着大众信息交流的语言,意识形态的新事物在当代书面汉语语言中涌现出来。

在第三章中,我清楚地说明了 20 世纪 20 年代在那些趣味平庸的期刊杂志中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女性主义基础。它们展示了一些基本的争论。因为当时的有性主体性(sexed subjectivity)和妇女解放理论家们都在这里申述他们的主张,并反复为他们的理论描述过去的和未来的社会组织意义。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新的人类学、社会学、人种学和父权制理论的学科知识,向妇女解放传授一种优生学的紧迫性,因为社会科学明确表示,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健康部分要取决于让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更自然一些。这个理论使“女性”(一个新词或新造的字,还是一个历史性的词语误用)成为自然选择的进化主体。然而,在发展的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女性”似乎注定要在一个死结中缠结不开。她的社会选择越来越多,而她的道德空间却无法拓展。简言之,如社会理论家指出,对进化的中国生物文化生命(biocultural life)的健康而言,其必不可少的关键是“女性”,但“女性”却是在本质上不健全的人。

“女性”,一个词语误用,进步论中国女性主义(Chinese progressive feminism)理论中第一个重要形象,符合国际启蒙真理的标准,因为它参与了正在全球化的对性的认识范畴。它不是中国殖民现代文化生活的独特发明创造。我坚持这一事实,即齐泽克之谜(Zizek's riddle)——对妇女社会多样性的主张之外,对主体妇女普遍性的解释——看起来似乎只能在精神分析文化批评中被解开,只能在历史层面被提出。确实,正像我在后面几章中提到的那样,精神分析理论是意识形态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巩固了国际上各种现代妇女概念。用意识形态术语来说,

在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种妇女优生学的观念同时在许多地方历史性地展现出来。殖民及至后来的革命现代化制约着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妇女历史主体,就像优生学的、生物学的、科学的和激进的思想方式同样制约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主义传统一样。〔6〕

尽管“人们的确在思考”,但思考不是自我创作。〔7〕当然,自我创作(女人写女人,男人写男人)相对来说是罕见的事件。第三章深信不疑地指出,即使正被讨论的作品是一般女性主义的,自我创作也只有在涉及较大的社会现实体系时才会发生。正像我所证明的那样,引起中国男女社会理论家注意的是有关人类繁衍的社会进化的大众观念。这可能是因为,各种自然选择理论都要求男女“选择”自己的生育伴侣。殖民理论家们在其著作中断言的主体“女性”,把她对真实性的要求建立在科学的普遍性基础上。性科学理论把妇女解放束缚到民族优先权以及自我强大的大男子主义幻想上。它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即妇女的身体属于她们自己,因为自然不仅这样制造了我们,自然还做出了这种超越所有其他生育方式的个体选择。整个 20 世纪不断加深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女性主义有时候作为男性的人造物品而被拒绝。然而,依我的观点看,男女理论家们共用这些相同的关键术语,因为他们都想在优生性学的讨论中为未来被解放了的中国妇女提供理论基础。〔8〕

本书前几章包含的妇女思想的相关例子不多。第四章“殖民现代性: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和与之相伴的第五章对丁玲(蒋冰芝,1904—1986,一个五十年来不断引人注目的中国革命妇女思想史中的重要人物)作了详尽的描述。“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是我杜撰的术语,用以帮助我重新梳理 1911 年帝制结束后中国思想领域中启蒙思潮的状况与特点。〔9〕我所提出的“殖民的”和“现代性”,辩证地融合了现代性的双重性,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现代性和殖民或帝国主义进程处于无法回避的重要事实中。现代性断然不能忽视殖民地商品的传播、政治和军事技术、政府管理、司法标准、科学和社会理论以及现代

风格。丁玲是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她早期的小说传播广泛,尽管它批判了核心的殖民现代主义优生学设想,成为进步论女性主义的组成部分。她具有创造力的小说提出了对“女性”无能这一问题的详细研究(对丁玲来说,女性主义是一个“理性”的转喻),从而迎合了对殖民现代性和启蒙充分性的检验。

第五章“毛泽东民族主义:丁玲思想中的‘妇女’”延伸了这一论证的线索。它指出,毛泽东主义理论框架的形成成为启蒙女性主义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使丁玲和其他女性主义的共产党人能够重新思考女性主义的主体应该是什么,以及作为革命国家的主体她们应该如何。在厌倦战争的广大农村中提出启蒙问题?从殖民现代性到现代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从有性的妇女主体到毛泽东主义革命群体,从婚姻到国家——在丁玲的长期流放中值得关注的,就是即使在最艰难痛苦的情况下,她那种使启蒙思想中的妇女问题持续出现的方式。最近,丁玲又在人民共和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平台复出。然而,这一次她是一个神话人物,被用来体现 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在进步论中国女性主义中被清晰阐述的理性主义原则。

第六章“社会主义现代化:李小江的市场女性主义”,分析研究了毛泽东逝世后那些年里中国启蒙女性主义的重新确立。1985 年的女性主义批评状况和 1925 年及 1945 年的状况相当不同。经济自给自足的结束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还见证了大学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政治科学和文学批评等学科的复兴。中国启蒙运动的学术传统为其制度上的特权重新创立了基础。而且,学术上的重建为又一个女性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一些经验丰富、有政治见识、精明能干且有学识的一代女性公民日益觉察到:国家正从一些正面的行动政策中抽身。第六章的主要人物李小江,以与李泽厚和刘再复(当代杰出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奉者)相对应的女性主义手法,在直接论述启蒙主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熟悉的问题。她又一次问道,就像理论家们五十年来一直追问的那样:“什么是中国女性主义真正的主体?”